

# 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 人物之面像與宗教觀

林渭富\*

## 壹 前言

一九一七年，舊俄二月，十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室遭到殘殺，俄國實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一九九二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正式宣告解體，由獨立國協取而代之。短短七十餘年，這塊跨越歐亞的浩瀚土地上發生了令全世界人類為之震動的劇變。

也許這種狀態只是政治上、國際局勢的一種律動而已，對於身在遠東的台灣民衆而言，獨立國協的政局發展似乎只與是否值得商人投資有關。但是同樣的土地，同樣的斯拉夫民族在歷史的巨輪之下卻依然維持著超絕的忍耐力，對未來和生活樂觀知命，在文學上的表現更是驚人。

「俄羅斯作家的熱烈情感，一向難與深邃的思想割離。他們在創作上，亦即在思想上的最大成就，如其十九世紀末的一位偉大思想家謝斯托夫（Leo Shestov）說的，『不是完整的思想體系而是思想之矛盾；不是肯定而是疑問；不是條理的觀念而是散亂的吼聲；不是結構而是幻想。俄羅斯人在思想上的探求，要凌駕於理性的真與假之上，是在探測那自由而不可想像，通稱為上帝的不合理智之最高境界』」（註一）

儘管有普希金的調和之美；萊蒙托夫的反抗精神；果戈理的含淚強笑；屠格

\*廣告學系大學部 83 年畢。

註一：張伯權譯，俄羅斯文學史，楓城出版社，民六十九年十一月四版，封底頁。



涅夫的敏感細膩；托爾斯泰的寫實，岡察洛夫的冷靜客觀；契訶夫的幽默感傷（註二），我們無法忘懷的，還是費奧多·米開洛維奇·杜斯妥也夫斯基（Fëdor Michajlovič Dostojevskij）。誠如 N.A 貝德葉夫所說：「杜斯妥也夫斯基在我的精神生命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他比任何作家都更激擾和提昇了我的靈魂。」（註三）這絕非溢美之辭。對杜斯妥也夫斯基有深刻體認的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也談到西方的文學，「除了少數例外，小說完全只探討人與人之間，情感與理智之間的關係，探討家庭、社交、以及階級的關係，卻從來不曾探討個人與自我或個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而這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看來，乃是最重要不過的。」（註四）

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的基調之陰沉、詭異，往往使初次閱讀他小說的讀者驚懼顫抖。他探索人類情感和思想的底層，「坦然啓現我們被壓抑的力與近乎病理的情緒……帶著一種被虐的喜悅與痛苦……」（註五）杜斯妥也夫斯基對人性的弱點太過於透澈，人物對白或自語往往帶著濃厚的哲學意識，以致於使讀者難以忍受。儘管如此，他在俄羅斯文壇乃至於全世界，已和托爾斯泰並稱巨擘。

近年少有願意花時間拜讀杜斯妥也夫斯基鉅著的讀者。速食文化腐蝕至文壇的結果，許多印刷精美、紙質柔順的產品充斥在暢銷書排行榜之上，大行其道。在不重視內容、只一味講求包裝、偶像的趨勢之下，現代「知識分子」正在大量失血。現代人追問自己是什麼，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的古老問題，我們都嘗試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這位精神上的導師請益。而這位謙遜的俄羅斯作家也毫不遲疑地、毫不保留地向全世界億萬個受苦的靈魂敞開他的心胸，撫慰著我們。

## 貳 精神與觀念

想要在寥寥數語之中詮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觀念，無異以管窺豹、以斗量海。杜斯妥也夫斯基把他的觀念編織在每一本小說中，有如錦繡一般。想把它們拆散，必須煞費苦心，但是他們的紋理卻是依稀可尋。（註六）唯一比較好的方法，是從每本杜氏的著作中挖掘他的觀念，設法加以呈現，而不顧其文字表面的混亂。紀德說得好：「……在他的作品中，觀念絕對不是以粗糙的形式出現，而

總是透過表現它們的人物做媒介……。」（註七）

貝德葉夫在其著作中將杜氏譽為大思想家、大想像家、大藝術家、天才辯證者，甚至是俄羅斯最大的形而上學家。「在他的著作中，觀念佔了最重要的地位，而辯證法則和心理學同列第二。這辯證法是他藝術的精髓。由於藝術，他走到了觀念世界的基地，而觀念世界又反過來使他的藝術豐澤。」（註八）

在一八六四年起連載於《世紀》雜誌的《地下室手記》，我們可以從中感覺到杜斯妥也夫斯基觀念的擾動。「我不僅不能變成惡意的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變成任何一種東西……不懂如何成為英雄，又不懂如何仁慈；不懂如何成為無賴，也不懂如何做老實人；不懂如何成為英雄，又不懂如何做蟲豸。現在，我就在這個角落裏生活，以這種惡意的無用的自慰來嘲弄自己：一個聰明的人絕不會一本正經的把自己弄成任何性質確定的東西；只有傻瓜才幹這種事。是的，在十九世紀做一個人，必須並且應當非常顯然的成為沒有個性的生物；一個有個性的人，一個性質確定的人顯然是受限制的。」（註九）

「我說，先生們，我們何不把這些展覽會統統踢翻，把理性主義撕碎，把對數表丟到地獄裏去，以便讓我們重新按照我們甜蜜愚蠢的意志生活！」（註十）

這部被評論家認為是杜氏著作中哲學意味最深刻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地下室人」（podpolya）的呼喊。地下室人從陰沉黝暗的地底深處反覆為自己的毀滅傾向尋求藉口，並且宣稱，行動只是愚蠢無知者的表現。《地下室手記》也宣布了杜斯妥也夫斯基至佳的辯證法，他已不再是一八六一年的《死屋手記》時期的老式人道主義者了，「原先僅是心理學家的他，從此而後成為形而上學家，追蹤人類的精神悲劇一直到底。」（註十一）

紀德在一篇討論杜氏的演講詞中驚嘆地說道：「我沒有見過杜斯妥也夫斯基更富於前後抵觸、自相矛盾的作家：尼采會稱之為敵對論。」（註十二）

《地下室手記》中的觀念，後來被杜氏本身加以闡述，在其他鉅著當中，我們都彷彿看到「地下室人」從地窖爬出，向世間的民衆發表激烈的演說。一八六六年開始連載於《俄羅斯通報》的鉅作《罪與罰》主角拉斯科尼可夫，正是這種觀念的化身。

註二：王兆徽等編，俄國文學論集，皇冠文教基金會，民六十八年五月，頁五。

註三：孟祥森譯，杜斯妥也夫斯基，時報出版社，民七十六年六月初二刷，頁十五。

註四：彭鏡禧譯，杜斯妥也夫斯基，志文出版社，民七十九年三月再版，頁十四。

註五：張伯權譯，同前，頁一六三。

註六：彭鏡禧譯，同前，頁五一。

註七：同註六，頁五二。

註八：同註三，頁十八。

註九：孟祥森譯，地下室手記，書華出版社，民七十五年九月三版，頁二十一。

註十：同註九，頁四十六。

註十一：同註三，頁三十三。

註十二：同註六，頁五四。



一八六五年九月杜斯妥也夫斯基寫了一封信給當時《俄羅斯通報》的編輯卡特可夫（Katkov）信中描述故事的大綱：「我認為這個故事的中心觀念不但與貴刊不相抵觸，而且相合。是一個罪犯的心理陳述。……剛剛完成罪行之後，立即感到孤獨的和人類割離的意識，使之痛苦萬分：真理的規律和人性勝利，凶手俯首稱臣，決定接受懲罰以贖罪。（我感到很難完整地說出我的想法）。我的觀念是：法律用來懲罰罪行的處分，使罪犯驚駭的程度，並沒有立法者想像的那麼深，因為他自己在道德方面要求這種處分。」（註十三）短短一封信的簡介當然不足以描述整個故事的張力和內涵，但杜斯妥也夫斯基親自向我們陳述「罪與罰」的構想，這一點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梅利可夫斯基（Nicholas Mikhailovsky）的《李奧·托爾斯泰與杜斯妥也夫斯基》（Lev Tolstoy i Dostoievski）一書當中將杜氏所處理的「現實」，形容為「科學家所處理的液化空氣」（註十四），小林秀雄也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是問題小說中有獨特表現的代表，其中強烈的哲學傾向，一半來自作者的天賦，一半也因俄國還沒有將哲學從藝術中獨立的傳統文化……而使杜氏的文學作品有驚人的異彩！」（註十五）

杜斯妥也夫斯基從來沒有為觀察而觀察。他的作品也不是先入觀念的果實，所以這些作品不光是理論，它們深植於事實。它們是事實與觀念結合的果實。是兩者極其完美的揉合，以致於誰也不能說那一個的成分多於另一個。……確切的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本本作品都由事實與觀念溶匯而成。《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雛型遠在完成前十年便已成型。（註十六）

對杜斯妥也夫斯基而言，觀念是大的浪濤，絕不是冰凍的範疇，觀念決定了人、世界與神的命運。它們的存在是十分動態的，沒有靜止不動的東西，沒有硬化的東西。亦即，杜氏的小說根本不是小說；它們是悲劇的某些部分——人類命運的內在悲劇，獨特的人類精神在其歷程的各個階段所顯示出來的種種不同的層面。（註十七）

### 參 人與超人

註十三：李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精神世界，先知出版社，民六十四年十二月，頁一二〇。

註十四：同註十三，頁一二二。

註十五：李永熾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生活，水牛出版社，民七十五年十月再版，頁一〇六。

註十六：同註十五，頁一〇五。

註十七：同註四，頁十八。

杜斯妥也夫斯基將其全副創造力傾注於一個主題：人及其命運。他以人為中心的程度幾乎是超乎想像的；人的問題是他整個熱情之所在。他並不把人看做只是一種自然現象，不認為人雖比其他自然現象優越，基本上卻是相似的；他把人看成小宇宙，存在之中心，一切皆圍著他移動的太陽；宇宙的謎是在人心之內，解決了人之問題即是解決了神的問題。整個杜氏的作品都是一場為人類的辯護。（註十八）

但是我們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看到什麼樣的人呢？從早期的「窮人」、「雙重人」，到「死屋」那些人，「地下室人」、「賭徒」、「少年」、「附魔者」、「白痴」、「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在這幾十位主角的張力之下，我們似乎站在黑夜的懸崖旁，搖搖欲墜。芮費耶說得好：「最使杜斯妥也夫斯基感到興趣的，就是這些黑夜的深淵，而他的全副努力乃在提示出這些深淵的深不可及。」（註十九）紀德補充道：「……一如在林布蘭的肖像畫中，陰暗是最重要的。杜斯妥也夫斯基把他的人物和事件加以組合，投以鮮明的光線，只照亮他們的一面。他的每一個人物都有深沉的陰暗環境，幾乎重疊在自己的陰影之上。」（註二十）我們注意到杜氏作品的首章第一節內往往充滿灰塵、惡臭、病態和不快；整部小說的情節也在這種氣息中推展。（註二一）以《白痴》為例，一開始是這樣描述的「十一月將來，早晨九點鐘，瓦爾嘯（華沙）列車疾駛地到達彼得堡。正是解凍的時候，潮濕而多霧，車窗左右十步以外什麼都看不清楚。……所有的人都是疲倦而冷得發抖，在夜行之後，眼皮都撩不起來，面孔灰黃有如霧色。」（註二二）《罪與罰》第一章則完全相反：「街道上格外的熱，既沒有一點風，又極其囂雜，那些粉屑灰塵，棚架，瓦塊，老是環繞著他，加上彼得堡的臭氣薰蒸……」（註二三）。杜氏筆下的人物，似乎永遠在情節下顫悸著。《雙重人》中的高利亞金的反抗、掙扎、呼喊：「但是我不容許人家把我當作一塊舊抹布踐踏。我不允許別人踐踏我，更不允許一個壞蛋這麼做。我不是一塊抹布，先生。我不是一塊抹布。……不錯，你看到的是一個卑賤的人，骯髒的抹布，但不是一塊單純的抹布，而是一塊有骨氣的抹布，雖然是謙虛的骨氣，是謙虛的情操，隱藏起來的。不錯，隱藏在抹布的折縫的深處，然而永遠是情操……」（註二四）

註十八：同註三，頁四十三。

註十九：同註四，頁一〇八。

註二十：同註十九。

註二一：歐茵西著，俄國文學史，華岡書城，民六十九年九月初版，頁一五六。

註二二：耿濟之，白痴，台南東海出版社，民六十四年五月，頁一。

註二三：耿濟之，罪與罰，書華出版社，民七十九年十月，頁二。

註二四：同註十三，頁二一二。



阿貝·德·聖赫阿勒 (Abbé de Saint-Real) 曾經說過：「小說反映一個人的外在行爲。」(註二五) 英美各國，可以劃入這一類的小說俯拾皆是。如黎薩哲 (Lesage)、伏爾泰、史莫萊 (Smollett) 等等。但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卻和這個類型相違。舉例來說，法國派作家面對人類靈魂的繁雜性，企圖作一番描繪，必要時，甚至會將事物稍加歪曲，壓抑一些背離主題的細節，並且盡量使某些曖昧不清的細節自圓其說，以便建立心理學上完整的一環。芮費耶在分析杜氏作品時說到：「一旦角色的構想在他心中成形，小說家必須在兩種實現的方式裏做一抉擇。他可以堅持其複雜性，也可以強調一貫性；在他行將塑造的靈魂中，他可以故意複製其絕對的黑暗，也可以憑他的描述替讀者撥雲霧而見青天；他可以尊重這個靈魂的深不可究，也可以把它們暴露無遺。」(註二六)

紀德接著說道：「……杜斯妥也夫斯基提供了什麼？他的人物毫不顧及連貫性，動輒屈服於矛盾和否定——他們怪異的體質不難做到這一點。前後矛盾似乎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主要興趣。……如果我們樂於承認人是衝突感情的居所，則沒有什麼不能解釋的。」這種共存的情形在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格外顯得詭譎，因為他的人物感情已經被壓迫到強度的極端，誇張到荒謬的地步。(註二七)

我們嘗試著直接由杜氏作品中幾段極具張力的情節，來驗證芮費耶和紀德的說法。

《白痴》中的主角麥什金向他的情敵羅格辛祝福他與女主角娜斯妲西亞時，我們讀到下面這一段對話：

「……我方才說我不能理解她為什麼要嫁給你，但是我雖然不明白，我卻相信必是有一種合宜的、明達的理由。……你方才親自對我說她已一變從前言行的態度……她對你自然不像你所說的那樣壞，如果她是的，她嫁你便和故意去淹死或謀殺一樣了，那可能嗎？……」

……

「被淹死或謀殺呀，」羅格辛終於開口了。「哈，她就是因為這個才嫁給我，因為她心念著被謀殺呀！……」

……

「……唉，她的腦子裏的事很複雜。她永遠是發著燒。有一天她喊出來：

註二五：同註四，頁一〇七。

註二六：同註二五，頁一〇八。

註二七：同註四，頁一〇。

『我要把生活告一段落，並且嫁你，趕快結婚吧！』她忙著定日子，但是日子一到，她又怕了，……她從你那兒跑開，因為她認識了她愛的限度，和你住在一起，使她太難受，……『定日子吧，』她說，『我都預備好了，來香檳酒，我們當流氓去吧！……』她喊道。……如果她嫁了我，我敢保證那是由於恨……。」(註二八)

再看看《少年》中的魏爾西洛夫吧！這個「雙重人」的矛盾與激動是如何呈現的呢？

「雖然我的心充滿了我不會表示出來的話語；固然充滿了的儘是那些奇怪的話語。你們要知道，我覺得我的身體好像分成兩極，」他帶著異常嚴肅的臉，還露出極誠懇的坦白的樣子，看了我們大家一眼。——「我真的是在思想上分為兩極，而且很怕這個情形。好像另有一個人立在你的身旁；你自己聰明而且有理性的，但是他一定要在你的身旁做出一些無意義的事情，有時還做出極快樂的事情；你忽然覺得你自己想做這些快樂的事情，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似乎帶著不樂意的樣子想去做，一面用全力抵抗。我曾經認識一個醫生，他在教堂內自己父親殯葬時突然吹起口哨來了。我今天真是怕去參加殯葬，因為我不知爲什麼緣故腦筋生出了一個確定的信念，就是我會忽然吹起口哨或哈哈大笑，像那個不幸的醫生一樣，結果弄得十分不好……我現在又把這神像取了起來，你知道，我現在正想把它往壁爐上一扔，往這個角落一扔。我相信它會一下裂成兩極的，——不多也不少。」(註二九)

在《地下室手記》中，「地下室人」向世界展示他的辯證法。人性是極端的、自相矛盾的、非理性的。「人無可救藥的被非理性的事物、無法無天的自由和苦痛所吸引……任何時候他都可能任性的選擇痛苦而不選利益。(註三十)

「他不肯讓自己去適應理性的生活組織，他把自由看得比幸福還重要。但這自由並非由理性統治心理之意；不，它寧是極端的非理性與胡鬧，是這種東西在無度的吸引他。」(註三一) 杜斯妥也夫斯基在人性的地下室中的這些發現在其後的每一本小說展開，並且決定了拉斯可尼可夫·斯塔夫洛金、伊凡·卡拉馬助夫等等的命運。

註二八：同註二三，頁二〇九。

註二九：耿濟之，少年，遠景出版社，民七十五年九月，頁五八八。

註三十：同註三，頁五三。

註三一：同註三十，頁五二。



在此我們必須提到尼采。他在《查拉圖斯特如是說》一書中所提出的「超人」理論，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人物——拉斯可尼可夫的超人信念是否連貫？尼采所標榜的超人一方面肯定意志的表現，即所謂「權力意志」；一方面又不受任何規範。（註三二）

《罪與罰》中，拉斯可尼可夫選擇了公開的反叛作為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他把人歸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顫抖的大多數群眾，另一種是少數的非常階級，他們有權違反社會律法傳統的規則與習俗。為了向自己證明他是屬於第二種人，拉斯可尼可夫殺死了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嫗以及其無知的妹妹。（註三三）

而在《附魔者》中，可瑞洛夫則以下面一段對白表露了他的怪異觀念。

「他們不好，」他又突然說，「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好。當他們發現他們好的時候，他們就不會去強暴小女孩。他們必須去發現他們是好的，因為這樣他們就會立刻變成好的，每一個人。」

「嗯，你已經發現了這個事實，所以我想你是好的？」

「我是好的。」

「事實上，我同意，」斯塔夫洛金低聲說，皺皺眉。

「那教人一切都是好的人會給世界帶來結束。」

「那教這種事的人已經被釘死了。」

「他會來，他的名字將是人——神。」

「神——人？」

「人——神。這裡面有不同。」（註三四）

紀德對此提出一點指導：「尼采的超人，雖然以無情為信條，卻不是對別人而是對自己無情。他企圖剝奪的人性，是他自己的。簡而言之，對於同樣一個問題，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提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決辦法。尼采要求肯定個性，對他來說，這是人生唯一可能的目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則力主放棄個性。尼采預定輝煌的成就，杜斯妥也夫斯基卻斷言徹底的毀滅。（註三五）

在《蘇魯支語錄》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所謂善與惡，還沒有人知道：除非是創造者！這就是為人類立目標的人，為地球創造意義，開未來，這人才創造出何者為善為惡。」超人不受世俗道德的約束，他是超乎善惡的。（註三六）

註三二：劉俊餘，論尼采的超人文化精神，哲學與文化，民六十三年第八期，頁二〇。

註三三：同註一，頁一五六。

註三四：孟祥森譯，附魔者，遠景出版社，民六十八年十一月，頁三四二。

註三五：同註四，頁一六七。

註三六：同註三二，民六十三年第九期，頁三五。

貝德葉夫則更為激烈的指出：「他們兩人（指杜氏與尼采）使人類不可能再返回古老的、理性的、自我肯定與自我滿足的人本主義，……可瑞洛夫想成為神，尼采則想要超越人……，要超越人而走向超人；因此，人本主義對人的崇拜最後是被超人所吞噬，因而毀滅。……而這超人則是魔幻式的偶像，吞噬了一切屬於人的東西。（註三七）

純粹的只探討人的本質，對杜斯妥也夫斯基來說，是不夠、也是不公平的。想要充份了解杜斯妥也夫斯基關於人的想法，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索有關罪惡與信仰的問題。

## 肆 罪惡

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於罪惡的刻劃及對罪人心理的挖掘，其成就是十分驚人的。他認為折磨人的罪惡感不是屬於某些人的特殊心理狀態，而是與人性分不開的事實。（註三八）

就「病源學」（Ätiologie）而言，人性向善的追求能力的結論應該是「人生本來就是幸福的」。那麼，現在所遭受的患苦，就顯然地不正常。病源學由果至因的追求，說明了在「善」的世界裏、隱藏了某種「惡」的根本。（註三九）

貝德葉夫的詮釋是：「惡與惡行是自由問題的重要部分。沒有自由，惡便無法解釋；有自由之處就有惡，若沒有自由，則惡的責任便只有落在神的身上。」（註四十）關於罪惡，杜氏的概念由於如此具有原創性，以致有許多人都無法對它做適當的領會。事實上，「他不僅是人類學家，而且是犯罪學家。因為他對於人性的疆界做了最深遠的探討，而這種探討使他深入罪行的本質。那越過了不可越過的界限的人，他的命運是什麼？這其中可能含藏了什麼樣的重生？杜斯妥也夫斯基顯示出罪惡的本體論。當自由透過不受限制的「自我意志」而走向罪行時，由於內在的天數，懲罰必隨之而來，這種懲罰乃是深藏於人類最內在的天性的。正因如此，杜斯妥也夫斯基終其一生都拒絕只從外在觀點來看罪惡。（註四一）

紀德也同意這點，並且認為這個問題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占了十分重

註三七：同註三，頁六三。

註三八：同註十三，頁二七四。

註三九：鄒昆如，從宗教現象看宗教教義的形成，哲學與文化，民六十三年第十期，頁九。

註四十：同註三，頁八十六。

註四一：同註四十，頁八十七。



要的地位。紀德說道：「杜斯妥也夫斯基如何不把魔鬼的領域劃入人類較低鄙的層次，卻把它劃入最高的層次——思想的國度、理智的席位——雖然整個人都可以做爲罪魁惡首的宅邸，成爲它的犧牲。」（註四二）

罪惡本身是一個奧秘，的確如此，古今多少哲學名家，誰又能對此提出清楚的解答？西方傳統思想認爲惡離不開善，惡是善之缺乏，是不存在的存在。然而這不存在的存在卻又那麼深刻的激盪人心，影響人類的生命！（註四三）

《舊約》描述上帝造人之初，人類始祖原本是無罪的，由於妄用了自己的自由，犯了重罪，失去了原始的無罪狀態，於是罪惡進入了世界，痛苦和死亡亦隨之而來。（註四四）另一種教會的說法，「原罪是我們本性上一種遺傳的邪惡腐敗、散布於心靈各部分，使我們爲神的憤怒所憎惡，而且在我們裏面產生了聖經所說的『情慾的事』。」（註四五）

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於罪惡的看法十分複雜，而這種複雜使某些人懷疑他是否是基督徒。他拒絕從法律的觀點來看待罪惡，他要認識罪惡。（註四六）杜氏反覆地使用不同的形式來表現這麼令他困擾的問題：什麼是可做的？一切都可以嗎？《罪與罰》、《附魔者》、《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都提到這個問題。人面臨著這個兩難式的問題：「在我的天性中有没有道德規範與界限，我敢不敢什麼事都做？」當自由墮落爲自我意志，這自由便認爲没有任何事情是神聖的或被禁止的，因爲如果沒有神只有人，則一切都是可以做的，人於是可以隨意試盡一切。而同時他卻被某種固定觀念所強佔，在這個固定觀念的暴政之下，自由很快就開始消失——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竭盡一切力量來探討的一個歷程。（註四七）杜斯妥也夫斯基將這種理論稱爲「馬馬虎虎的理論」，但是這個馬馬虎虎的理論卻完完全全是唯理哲學和唯心哲學。拉斯可尼可夫嘗試著要去超越人類天性的藩籬，去殺一個「沒用的、可憎的、有害的生物」，結果喪失了自己本質的人性，也把自己與人類的整體分割了。在「罪與罰」末段，我們可以看見拉斯可尼可夫的崩潰，同時也是超人理論的崩潰：

他忽的記起梭娜的話，「到十字街頭，跪在大眾前面，吻著泥地，因爲你對它也負罪了，再對大眾高聲說著，『我是一個凶手呀！』」他想起那話，便

註四二：同註四，頁一四九。

註四三：同註十三，頁二七八。

註四四：同註十三，頁二三二。

註四五：徐慶譽譯，基督教要義，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民六十七年十二月四版，頁一六〇。

註四六：同註三，頁八九。

註四七：同註四六，頁九二。

怔住了。他沒有一刻，特別最後幾個小時，那無限的苦惱和憂慮沉重的壓迫著，他不得不將這種新鮮的完全握著。這就如突然而起的病降臨一樣；這彷彿一個火花在心中焚燒，延遍他的全身，他身體各部全癱化了，眼淚不覺突眶而出。他立即昏倒地上了……。

他在市場的路跑了，露著乞社和狂歡和泥土接吻著。他起來後復又跪下。（註四八）

《附魔者》中，杜斯妥也夫斯基更從長研討自我意志付之罪惡行動的主題。當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觀念摒除神的存在之後，產生了什麼致命的後果。

斯塔夫洛金，這位《附魔者》中的代表人物，是比無神論者還要拒上帝於千里之外的人。心靈無底的空虛，熱情的缺乏，使他不曾流淚，不曾後悔。空虛、冷酷、厭煩使他只爲了滿足自己的無情而犯罪，而沉淪。但是他無力懺悔，更無力以愛心及信仰填補心底的空虛。伊文·侯威（Irvinig Howe）說：「斯塔夫洛金是混亂的根源，透過他的特性表達出來。……他追逐肉慾，因爲想成爲一個縱情恣慾的人。……杜氏以爲對人之限度的體驗是屬於人的本質的，他的悲劇是只能以空虛感代表畏懼感……。」（註四九）他感到一股邪惡的力量控制著他，而這又類似「雙重人」的經驗。「突然之間，他用短而不連貫的話，述說他曾受幻覺的控制，特別是在夜裏，可是他說的事不易了解，他說有時看到或感到身旁有一個邪惡的東西，會嘲弄人，有理性，以不同的面目和性格出現，但常是同一個傢伙。他自己常爲此而發怒！」（註五十）

「怎麼呢！這份偉大的懺悔在形式上就有可笑的成份。噢，不要想讓自己相信你不曾從這裏面勝利的站起來，」……。

「那麼你認爲或許只有它的形式有可笑之處？」斯塔夫洛金堅持道。

「實質也有。它的醜惡會殺了它。」提杭小聲說，眼臉下垂。

「醜惡？什麼醜惡？」

「罪惡的。……」（註五一）

斯塔夫洛金到最後並沒有依照提杭神父的建議入修道院爲僧，只因提杭感覺到斯塔夫洛金可怕的意圖而驚恐地遁去，只留下「你這該死的心理學家！」這句

註四八：同註二三，頁五〇五。

註四九：同註十三，頁二九九。

註五十：同註四九，頁三〇一。

註五一：同註三四，頁一十二一。



話和自我毀滅。

## 伍 信仰——大宗教裁判官與基督

一般評論家都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自一八六五年完成《罪與罰》之後一直到逝世為止，最關心的主題是宗教與基督教教義。如同《附魔者》中的可瑞洛夫所說：「上帝折磨了我一生。」一樣，杜斯妥也夫斯基提出問題，辯論問題。

「他將自己心智永無止境的爭論寫入了小說之中，藉著書中的人物來與自己辯論。」（註五二）

要了解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信仰的問題，我們首先必須探索俄羅斯人和希臘正教。

希臘正教容許——不，應該說是贊成——公開懺悔；這顯然只是鼓勵一種民族傾向。懺悔——不是喃喃低聲訴入牧師耳裏，而是當眾公開聲明——這種念頭一再出現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中，簡直有如著迷一般。（註五三）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大多數人物——包括他自己在內——都可能在一種出其不意的狀態下向某個陌生人或毫不知情的人懺悔。

「俄羅斯靈魂的結構完全是獨特的，和西方人完全不同。……俄羅斯人的靈魂是啓示錄性的，其體質結構是流體的、缺乏規律，……俄羅斯人在面對文化危機的時候是漠不關心的，……俄羅斯人特有的虛無主義正是由此而來。」（註五四）

在此我們選擇將宗教、信仰的問題放在最後來探究，《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伊凡的史詩——「大宗教裁判官」是最主要的理由。「『大宗教裁判官』杜氏作品中的至高點，也是他辯證法的王冠。若想尋求他在宗教方面的建設性觀點，非此莫屬。在此處，一切糾葛都解開了。」（註五五）但是，我們發覺，傾全力為基督辯護的人竟是無神論者伊凡·卡拉馬助夫。那麼，作者到底是站在那一方呢？大宗教裁判官？抑或是耶穌基督？

在此我們要稍微偏離主題，談一下無神論。

《附魔者》中「斯塔夫洛金的自白」的提杭神父說道：「絕對的無神論者已

註五二：同註一，頁一五七。

註五三：同註四，頁八四。

註五四：同註三，頁一四八。

註五五：同註三，頁一七一。

經站在最後一級上，再邁一步就是完全的信仰，……。」（註五六）

只就「無神論」這個字而言，它沒有歧義。此字用以表達各種不同的現象：一、直接了當的否定上帝；二、不可知論，因為人能認識上帝，所以不能談論上帝；三、一種立場，有些人用來解決上帝的問題，但卻不知所云；四、以實證科學的觀點來說明問題或否認絕對的真理；五、人的一種概念，使他減弱對上帝的信仰，但又不是否定；六、一種自造一個上帝的思想；七、不關心主義，有些人沒有宗教的衝動，不明白為何要討論上帝。（註五七）

然而在無神論者否定了上帝之後，往往不能不投靠一個自己幻想出來的偶像去加以崇拜，這暴露了無神論者的一個基本弱點。……當人的意識不能接受神的觀念時，假神一定出現，並向此種偶像奉行他的敬禮。……在這偶像中，他自以為有改變一切的能力。如科學的科學主義，藝術的美學主義，道德的道德主義，社會正義組織的共產主義。（註五八）

「大宗教裁判官」的史詩一直是西方評論家熱烈討論、也是熱烈爭論的對象。從表面上的詞句看來，杜斯妥也夫斯基藉著伊凡的話來批評羅馬天主教，因為它以權威、教條、禮規、形式等等代替了恩惠、自由、精神與愛。（註五九）大宗教裁判官的秘密乃是他並非與基督協同努力，而是跟他：「我們不是跟你協同，而是跟『另一個』：這乃是我們的秘密。」（註六十）在杜氏看來，天主教的神權統治便是其一，在拜占庭正教中也是，在一切專制政體和帝國主義中，也能辯識這些歷史假面。（註六一）

白爾鐵夫（按：即貝德葉夫）指出，「大宗教裁判官」的目的，如果在於攻擊天主教，那是非常次要的，其主要的目的在於攻擊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註六二）

再者，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精神上忠於傳統的東正教，他最重視的是隱修制度所代表的精神，而不是教會的外在體制。（註六三）

大宗教裁判官和基督的相遇，說明了自由與強迫，對生命意義的信與不信，神聖的愛和人道主義的憐憫，基督和反基督的對抗。杜氏把大宗教裁判官寫得很

註五六：同註三四，頁九九〇。

註五七：陳榮華譯，當今無神論的各種現象，哲學與文化，民六十九年九月七卷九期，頁七。

註五八：同註十三，頁三六一。

註五九：同註十三，頁三八六。

註六十：耿濟之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台南東海出版社，民六十六年一月，頁二九四。

註六一：同註三，頁一七八。

註六二：同註十三，頁三八六。

註六三：同註六二。



令人震動。他是「被巨大的憂傷與對人類的愛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殉道者」之一，但是他有一個秘密：他並不信仰神，也不相信生命的任何意義。而唯有信仰神，才能使人以祂的名而感到受苦是有意義的——由於失去了這個信仰，他認為大多數的人都沒有力量承擔基督所賦予他們的自由重擔。（註六四）

杜氏的大宗教裁判官，所攻訐的對象主要是無神論的與唯物論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和大宗教裁判官所構想的社會完全相合。對耶穌所拒絕的誘惑表示歡迎的是社會主義——它尤其歡迎最危險的那一種：把石頭變成麵包。這一種「奇蹟」的代價乃是喪失自由，但社會主義卻以大眾的滿足為名而摒棄自由。它崇拜的是世俗的王國，而世俗王國的代價也是精神自由的喪失。這兩種體系都是對「真理」、「神道」的不信仰所產生的後果。若真理和神道已不存在，則剩下的便只有一種有價值的動機，即對大眾的同情。我們用不著說在這裏是把社會主義當成一種新宗教，而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制度，因為社會主義即使只用後者的名目就已經夠掩人耳目了。（註六五）

阿萊莎聽完其長兄伊凡的史詩之後，發現了什麼？

「……你的史詩是對於基督的頌讚，並不是詛罵……你本來想這樣做的……但是你的那些人是什麼東西？他們完全不是那回事，完全不是……他們只是為設立未來的、全世界的地上的王國用的羅馬軍隊……這就是他們的理想……祇是一種取得政權的願望，取得地上齷齪的利益，奴役他們的願望。……好比是未來的農奴制度，而他們就是地主……你的受痛苦的裁判官只是一種理想罷了……」。（註六六）

「宗教裁判官沉默了，一時等待囚人的回答。他的沉默使他感到痛苦。他看見囚人一直聽他的話，懷著深刻的感情，靜悄悄地盯看他的眼睛，顯然不願意反駁。老人希望他說什麼話，那怕是悲苦的，可怕的話。但是他忽然默默地走近老人身邊，靜悄悄地吻他失血的、九十歲的嘴。這就是全部的回答。老人抖索了一下。他的唇端上微微地動了一下；他走到門前，開了門，對他說：你去罷，不要再來……完全不要再來……永遠也不，永遠也不！便把他放到城市的黑暗的人行道上。囚人於是走了。

「老人呢？」

「吻在他的心上熾燒，但是老人仍舊保持著以前的理想。」

註六四：同註三，頁一七二。  
註六五：同註六四，頁一八一。  
註六六：同註六十，頁二九七。

「你也同他在一起麼？你也是麼？」——阿萊莎悲苦地喊。（註六七）

阿萊莎立刻看出伊凡與宗教裁判官之間的連結，而伊凡也沒有否認。大宗教裁判官是伊凡的理想人物，也就是他自己的化身。「因為他拒絕承認這個世界，他要把它從上帝手中搶奪過來，為了給他一個不同的，更好的秩序……。」（註六八）

「大宗教裁判官」包含了杜斯妥也夫斯基宗教觀念中最佳的建設性部份：它比《作家日記》或曹西瑪或阿萊莎的故事中所包含的更為一致。基督的隱藏形象和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相近——同樣具有崇高的自由精神。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給我們的教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但是直至現在卻似乎一直未能引起注意。在他之前沒有一個人這般強烈的把基督跟自由的精神——這自由精神是只有極少數人才能達到的——合在一起。他把基督教的「人類中心觀」的結論推至極限，人的形象永遠存在，而正是在此中含有他特有的基督教特質。（註六九）

## 陸 結語

有生之年，杜斯妥也夫斯基未能見到那個曾經讓他流放西伯利亞十年的俄羅斯帝國崩潰；一百餘年後，蘇聯就在我們眼前瓦解。杜氏曾在給友人的信裏談到，「社會主義已經瓦解了歐洲：假如我們拖延時日，它會把歐洲完全毀滅？」（註七十）雖然是不太準確的預言，杜氏對於社會主義的虛妄，在《附魔者》中，由夏托夫顯現出來了。席伽利奧夫在他的理論結尾時也供認：「我怕我的資料相當紊亂，而我的結論跟我開始的原本觀念完全相反。我從無限制的自由開始，結論卻是無限的專制。」（註七一）

儘管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期，蘇聯境內有關杜斯妥也夫斯基其人及其著作的專書、論文汗牛充棟，甚至連他的十三卷全集也都出版，但是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五四年之間，他的作品，如《地下室手記》、《附魔者》與《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等批判社會主義的書都被列入禁書，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才陸續開放。

印象所及，五十年代的學子，對於杜斯妥也夫斯基有著一份熱誠的情感，他們的狂熱，無論是想一窺大師深邃的堂奧也好；附庸風雅以致成為相聲說笑的素

註六七：同註六七，頁三〇〇。  
註六八：同註十三，頁三八九。  
註六九：同註三，頁一八四。  
註七十：同註四，頁四二。  
註七一：同註三四，頁五七九。



材也好，杜斯妥也夫斯基對那一個年代而言，是遙遠但卻不陌生的精神導師。

一九九二年，是有如火焰一般不斷變動的時代。在歐俄那塊孕育出矛盾、衝突、熱情的杜氏的大地上，帝俄消失了，蘇聯崩潰了。雖然變遷如此，杜斯妥也夫斯基卻仍是全世界最具影響力、讀者最多的偉大作家之一。

### 參考資料

- 一、新約全書。
- 二、俄羅斯文學 張伯權譯，楓城出版社。
- 三、杜斯妥也夫斯基 孟祥森譯 時報出版社。
- 四、俄國文學論集 王兆徽編 皇冠文教基金會。
- 五、杜斯妥也夫斯基 彭鏡禧譯 志文出版社。
- 六、地下室手記 孟祥森譯 書華書局。
- 七、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精神世界 李震著 先知出版社。
- 八、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生活 李永熾譯 水牛出版社。
- 九、俄國文學史 歐茵西著 華岡書城。
- 十、白痴 耿濟之譯 台南東海出版社。
- 十一、罪與罰 耿濟之譯 書華出版社。
- 十二、少年 耿濟之譯 遠景出版社。
- 十三、附魔者 孟祥森譯 遠景出版社。
- 十四、基督教要義 徐慶譽譯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 期刊論文

- 一、論尼采的超人文化精神 劉俊餘著 哲學與文化。
- 二、從宗教現象看宗教教義的形成 哲學與文化。
- 三、當今無神論的各種現象 陳榮華譯 哲學與文化。